

苏联在中亚伊斯兰教政策的历史嬗变^{*}

邵丽英^{**}

内容提要 苏联的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经历了十月革命后的期望与失望，一部分人投入巴斯马奇运动，一部分人成为与政权合作的“进步人士”。前者被镇压，后者因影响力增大又不全力配合苏联政府的世俗化政策而被停止了部分宗教活动。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穆斯林作为苏联公民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其宗教活动渐趋活跃。

关键词 苏联 伊斯兰教 巴斯马奇运动 中亚

苏联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状况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这类文章几乎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即对苏联政权的政策给予辩护，而对伊斯兰教及其教规加以尖锐批评。随着苏联解体，越来越多苏联当局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文件得以公开，使逐渐恢复苏联体制下伊斯兰教状况和穆斯林生活的真实图景成为可能。

一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宗教政策

指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伊斯兰教政策的基础是列宁的宗教思想。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曾提出必须为争取“信仰的完全自由”而战，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尊重一切真实的信仰”等。然而，随着苏维埃政权逐步确立，列宁改变了看法，认为“宗教是文明与进步的敌人”，“马克思主义视一切现代宗教、教会以及所有宗教组织为资产阶级反

*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子项目“中亚现代文明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ZDB060）。

** 邵丽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动机关”，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宗教的敌人”^①。在宗教盛行的封建、前封建关系占优势的落后地区，尤其要与宗教界和泛伊斯兰主义作斗争，这成为苏维埃政权及其后建立的苏联对待宗教的思想基础。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在俄国生活着 2000 多万穆斯林。对这些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而是他们的世界观、生活方式以及道德和法律体系。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不仅在精神上滋养着教徒，还依照伊斯兰教教法主持法庭。国民教育事实上也处于他们的控制下。当时，俄国有 2.6 万座清真寺，几乎每座清真寺都有属于自己的学校。

除此之外，在布哈拉、希瓦等汗国大约还有 1.5 万座清真寺。在农村，教士不仅是宗教的捍卫者，还是儿童的教师，甚至还可能是村里唯一识字的人。只有宗教人士才能帮助村民与外部世界交往。只要一声召唤，无论红白喜事，他们都会赶到信众家里做仪式，以安拉的名义圣洁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琐事，然后与他们一起用餐。在这种宗教与社会生活深入交织的情况下，任何触犯宗教界利益的国家政策都可能引起信徒不满，激发他们对社会生活新制度的反对，当局不能不重视这一点。

城市宗教界对革命政权更加排斥。1917 年 12 月 3 日，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作为新政权关于民族政策的重要文件。它明确宣告：俄国人民愿意谋求真诚的和平，愿意帮助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为此将废除沙皇政府签订、克伦斯基政府确认的瓜分波斯和土耳其的条约。同时向俄国全体穆斯林宣布：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机构和文化机构都是自由和不可侵犯的。穆斯林的权益将受到革命政权的全力保护。同时呼吁宗教界支持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②该宣言颁布后，全俄国穆斯林会议（苏维埃）执委会主席阿·扎里科夫便提议与人民委员会“共同工作”，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领导人斯大林也对此回应称，全俄国穆斯林会议与当局合作是必需的，如此才能保障穆斯林劳动群众的利益。

然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很快发生扭转。1918 年 2 月 2 日，经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颁布《信仰、宗教和教会团体自由》法令，重申信仰自由：

①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М. Ф. Муртазина, А. А. Нуруллаева: Ислам и мусульмане в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1999 г., стр. 118.

② 陈之骅主编《苏联历史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 138 页。

每位公民都享有信仰宗教和不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权利和义务平等，不允许以强迫或惩处的措施进行宗教联合，绝对禁止颁布任何地方性法令或以命令形式限制信仰自由。此外，该法令最重要的是要求政教分离，强调宗教组织不能参与任何国家事务。废除宗教宣誓，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活动从此不能带有任何宗教色彩。公民的出生、死亡，结婚、离婚等事项的登记全部转由政府机构管理。宗教组织的所有财产，包括教堂及其所属不动产全部国有化，国家为宗教团体提供免费祈祷场所。学校与教会分离，强调教育必须世俗化，消除宗教的影响，不允许在国家、社会以及私人学校宣讲宗教。这意味着，宗教从此只能在私人层面上进行，宗教组织的活动也只能局限于满足公民的宗教需求。

1918年12月3日，已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完全照搬执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通过了宗教与国家分离、学校与宗教分离的法令。但出于伊斯兰教传统的影响，法令中的内容很难立即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呼吁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实现革命性变革，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随即被派到塔什干。尽管列宁也强调要关心贫苦穆斯林的教育问题，力争解决问题成为东方的榜样。但是，无论列宁还是斯大林都赞同“与泛伊斯兰主义作斗争”。为此，斯大林提出并开始强化穆斯林的民族认定，这一举措不仅有效而且影响深远。^①

当时曾有专家提出保留宗教学校的建议，即世俗学校和宗教学校并存，尽量避免对伊斯兰教进行批评，尤其不要在国家东部地区谈及与宗教进行斗争。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世界观的较量，所以不应采用强制手段。“与泛伊斯兰主义作斗争”这种口号无疑迫使安全机构投身其中，势必引起东方民族的反感，从而导致后者一致反俄。后来的事实表明，在许多方面这些专家的建议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当时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高歌猛进的时代，这种声音过于微弱，以致无人“听见”。1919年9、10月，在突厥斯坦共产党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监察委员会已经在检讨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执委会没有适时地采取措施执行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政策，并责令中央执委会

① С. М. Исхак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мусульмане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есна 1917г. — лето 1918г.), Москва, 2004г., стр. 490.

改过。此后便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了：取缔宗教法庭、废止宗教学校、没收 1919 ~ 1920 年宗教机构获得的不动产。这引起了穆斯林的广泛不满，进而强化了中亚的“巴斯马奇运动”。^①

二 “巴斯马奇运动”后穆斯林的分化

1922 年 7 月 31 日，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执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凯伊盖赛兹·阿塔巴耶夫认为“1919 ~ 1920 年在费尔干纳出现的已经不是匪徒暴乱，不是巴斯马奇运动，而是一定程度上的人民起义。”“四年来，我们甚至不能正确阐明这一运动的性质，一直称其为巴斯马奇运动，当时这已经是起义了。‘巴斯马奇’一词意为匪徒暴乱，这是不正确的定义，它不能引导我们正确解决问题。这也是四年来我们没能消除这一运动的原因。”^②他介绍说，政府已对巴斯马奇运动渗透的农村失去控制。尽管为占领费尔干纳谷地派去了 3 万名红军，遍布所有大的村庄，但居民仇视当局，巴斯马奇分子很容易就将守军赶出村庄。

1921 年 8 月，费尔干纳谷地巴斯马奇运动首领之一库尔巴什·阿拉亚尔向当局提出与苏维埃政权和解，但条件是保证宗教学校、清真寺以及伊斯兰教法不被侵犯，恢复宗教法庭，将没收的不动产归还宗教组织，恢复农业私有制和手工业生产，巴斯马奇队伍加入红军。尽管这些要求显然也是穆斯林居民的要求，但是遭到当局拒绝。

然而，僵持的局势迫使苏联领导层正视中亚穆斯林的诉求。1922 年 5 月 12 日，负责边疆工作的奥尔忠尼启则就布哈拉局势致电斯大林。他指出：“布哈拉的局势可以说几乎是全面的起义……起义正在变成有组织的行动。”而突厥斯坦对于东方又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牵制印度和中国“意义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放宽”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为此，斯大林

① “巴斯马奇运动”爆发于 1916 年，主要指中亚穆斯林反对苏联统治的社会运动，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逐渐消亡。

②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М. Ф. Муртазина, А. А. Нуруллаева: Ислам и мусульмане в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1999 г., стр. 125.

回电说“我完全支持解散布哈拉共产党。”^①1922年5月3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做出“关于突厥斯坦—布哈拉事务”的决定，旨在采取措施安抚边疆、吸引农民群众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来，为此大赦所有投降的巴斯马奇运动成员，恢复宗教法庭，开放清真寺和初等、中等宗教学校，将不动产归还宗教组织。

1923年，中央政府还将沙皇时期从撒马尔罕掠得的“奥斯曼可兰经”转交给乌兹别克的穆斯林，更为重要的是允许境内穆斯林接受宗教团体的宗教教育。这些决定从政策层面已经基本上满足了穆斯林的要求，但问题在于这些决定很难付诸实施。此前的政策惯性势如破竹，难以更改。如在花刺子模，1923年10月召开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仍然宣布宗教与国家分离；没收宗教界不动产充公，而这部分不动产占花刺子模共和国全部可耕地的40%以上；剥夺整个宗教界的选举权；宣布花刺子模为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举措加之过激行动引发的政治后果极其严重，致使原本忠顺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宗教界人士，还有一大部分农民都开始远离革命政权，许多人甚至拿起武器反抗苏维埃制度。此前由祖纳伊德罕领导的巴斯马奇分子本来躲在当地的沙漠里，只有500名骑兵。这时，乘机攻入花刺子模绿洲，队伍人数不断增加。到1924年11月，骑兵和步兵加起来已达到1万~1.5万人，致使他们有力量围攻花刺子模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由于苏维埃突厥斯坦各方救援，才使花刺子模免于失守，巴斯马奇分子被迫撤回沙漠。

面对穆斯林的强力抵抗，中央执委会和花刺子模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让步，1924年3月，修正了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决定，尤其是扩大选举权、归还不动产给宗教组织、恢复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允许建设新的清真寺等。这些措施实施后，穆斯林地区经济、文化稳步繁荣，特别是地方居民代表被吸收参加管理地方事务，加深了对穆斯林的安抚。对新政权持善意态度的人在增加，穆斯林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穆斯林坚持不接受社会生活新制度，十分明确地表态保留旧秩序，这部分人占多数；另一部分穆斯林以支持的态度对待新政权，这部分宗教人士被称为“进步人士”，这部分虽为少数派，人数却在持续增加。

^① 沈志华总编，余伟民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1—255页。

立场的分化表现在对待诸如巴斯马奇运动、农业改革、妇女解放、国民教育、不动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等诸多问题。在这些工作中,“进步人士”十分活跃,他们开始拜访清真寺,争取妇女平等参加社会活动。伊玛目雅库波夫在喀山城 12 个教区的清真寺倡议和组织妇女小组,对妇女进行宗教宣传,让妇女知道她们享有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这个妇女小组对促进其他教区的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起到了示范作用。雅库波夫伊玛目还积极鼓励女性穆斯林参加城市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据他向选举委员会通报说,在他的教区 80% 的女性穆斯林都参加了选举投票。1926 年 7 月 26 日,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决定推广对穆斯林妇女进行宣传教育的经验。为此,1927 年 8 月 7 日通过了专门的工作细则,制定了详细的与女性穆斯林谈话的计划和组织座谈会的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倡议,政府都接受。例如,塔什干等城市提出出版刊物的倡议就遭到拒绝。进步人士还提出改革伊斯兰教初等和中等学校教学科目,将数学、地理、中亚的语言等列入教学,理由是这可以使年轻人获得更多的世俗知识。1925 年 9 月 3 日,国家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共同颁布关于在东方民族中宣传穆斯林信仰的规定:禁止在世俗学校进行宗教宣传。宗教宣传只能在清真寺进行,而且是在学校不上课的时候进行,只能对那些已经完成了在学校的第一梯级教育或者年满 14 岁的儿童进行宣教。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明令地方政府必须保证清真寺下设的学校不进行世俗课程的授课。

由于苏联当时没有足够的世俗学校接纳所有学龄儿童,宗教学校又禁止开设世俗课程,宗教界的“进步人士”提出在宗教学校和世俗学校之间设立由居民出资兴办的“中间学校”。这种学校既开设世俗课程,又教授伊斯兰教法。在伊斯兰教传统势力较强的地区普遍支持这一建议,但遭到政府的反对。1927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全体会议反复强调,世俗学校不能与“中间学校”并存。理由如一位参会者所言“如果居民在中间学校既能得到关于真主的知识也能学到科学知识,那他自然将选择这个学校,而不去选择无神论学校。”^①结果必然加强伊斯兰教势力在信众中的影响力,而不利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

① РЦХИДНИ. Ф. 62. Оп. 1. Д. 219. Л. 108.

党和国家机关拒绝接受宗教界“进步人士”的某些建议，但并未影响后者在穆斯林中威望的上升。20年代上半期，由“进步人士”组成的沙里亚教法机构在突厥斯坦诞生。按照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央执委会机构条例的认定，该机构属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纽带”，致力于领导宗教法庭，监督不动产的使用，考察宗教学校教师、法官、伊玛目和穆安津（宣礼员），并确定其职责。沙里亚教法机构不仅对苏联当局的各项倡议持支持态度，而且在行动上努力促进这些倡议的实现。如1923年他们按照苏维埃的培训大纲在费尔干纳谷地开设教师培训学校。

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虽然坚决反对赋予沙里亚教法机构作为国家政权机关和伊斯兰教信众之间的中介角色，但还是确认了该组织的合法性。这使得其他地区纷纷仿效。1927年，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等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宗教机构。其中，费尔干纳较为突出。该地的宗教组织在农村有自己的代表，并积极在农村建立学校，研究伊斯兰教法，组织信众会议，主持穆斯林的宗教生活。20年代后期，哈萨克斯坦也开始出现穆斯林的宗教机构，1928年，在哈萨克自治共和国隶属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的55个职能机构中20个机构决定效法乌兹别克伊斯兰宗教组织，同时成立了15个宗教管理机构。

突厥斯坦的宗教“进步人士”宣称与苏联的党和国家机关合作。他们在各种会议上都表示反对巴斯马奇运动，支持国家进行的土地—水利改革，赞同妇女解放，并向苏联政府对异教的宽容表示感谢。这种与中央政府合作的策略，使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得以留存下来的穆斯林宗教机构不仅未被取缔，而且在中亚和北高加索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发布文告，号召穆斯林要在新形势下采用新的工作方法；通过散布自己出版的杂志《伊斯兰》，向各地派出的工作人员贯彻指示。

三 斯大林对宗教界的压制政策

穆斯林“进步人士”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显然与苏联上层的意愿不符。各地党组织和政府开始限制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的影响。192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按照国家宗教管理机构章程取消了该组织的注册。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不希望与国家走向对抗，同时又要面对地方宗教界协调穆斯林宗教

组织的需求。因此,打算利用自身的经验,在中亚和北高加索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中心,并在 1926 年的穆斯林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议。中亚和北高加索的参会代表自会后,便开始在乌兹别克和其他中亚共和国创建穆斯林宗教机构。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的穆斯林甚至通过决议要召开乌兹别克穆斯林代表大会以建立共和国宗教管理机构。

苏联的立场是坚决反对穆斯林宗教组织在统一的宗教中心的庇护下联合起来。地方当局也竭尽全力阻挠建立共和国穆斯林宗教中心的企图。1927 年 5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会议讨论决定,“将采取措施阻止穆斯林宗教界联合成统一的集中组织,并且要反对扩大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对中亚和北高加索施加的影响”。^① 1928 年 12 月 14 日,针对如何在国家东部反对宗教势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反宗教委员会主席 E. 雅罗斯拉夫斯基做了报告。在给地方的决议中强调“要与各共和国穆斯林宗教界有组织的联合趋势作坚决的斗争。”如果说,这些会议报告的表述尚比较含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宣传鼓动部主任罕苏瓦洛夫的用语就更加露骨了。他在阐述党对待进步和保守穆斯林宗教派别的方式时说“如果你想战胜敌人,应当激化敌人内部的冲突,进而打击敌人。让进步的宗教人士去反对反动的一方,引起他们的内斗,这是非常必要的。”^② 这种主张的依据是随着“进步人士”在穆斯林中影响扩大,穆斯林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越发不顺从了,他们对国家采取的限制宗教信仰的措施表示普遍的不满。

1926 年上半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叶拉布加县和阿格雷兹县的穆斯林宗教界联合代表大会提出:宗教学校儿童受教育的年龄应和苏维埃学校相同;废除关于宗教教育只能在清真寺进行的限制;允许出版宗教书籍;政府应该促进《可兰经》的出版;苏维埃教师不应进行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反宗教的教育;恢复居民在清真寺的活动;宗教人士及其家庭应享有所有的公民权等。由于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领导层认为不宜将过于激烈的言词写入大会决议,所以在代表大会决议中并没有直接要求返还宗教学校的教产,而是提出“采取措施将从前属于初等和中等宗教学校的校舍交给所在教区

① РЦХИДНИ. Ф. 62. Оп. 2. Д. 876. Л. 7.

② РЦХИДНИ. Ф. 62. Оп. 2. Д. 1145. Л. 33.

的苏维埃支配”；同时要求“允许那些没能在苏维埃的学校接受教育的儿童在任何年龄、任何时间研习宗教信仰”；“苏维埃的学校不得进行反宗教的宣传”；“允许报刊发表反对无神论的言论”；“允许宗教学校每天都可以进行信仰宣教”；“民众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设宗教课程和宗教学校”；“开设宗教学校不一定非要在清真寺”等。这些要求的确反映了当时穆斯林的诉求。苏联党的机关将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视作国家穆斯林宗教势力加强的体现，认为这表明伊斯兰教界对居民的影响在加深。因此，在国家领导层内部，持以强力斗争方式应对宗教界特别是伊斯兰教界人士的主张占了上风。

1927年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要求党在各共和国和州的领导机构“同穆斯林居民”全方位地讨论问题，目的是“加强同无疑在上升的穆斯林宗教界的影响作斗争”，因为这种势力正在影响穆斯林居民的政治生活。不仅如此，联共（布）还应加强经济影响力，并通过宗教学校授课、清真寺宣讲、宗教出版物、选举运动以及政府的相关决定、决议等，全面影响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联共（布）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对伊斯兰运动的打压在1917年革命胜利后的第二个十年达到空前规模，其标志性信号是斯大林的讲话。他说“党不能在对待持有宗教偏见的人、对待毒害劳动人民思想的反动宗教界方面中立了。我们要镇压反动的宗教界吗？是的，镇压！不幸只在于他们尚未被完全消灭。”^① 档案文件显示，1926年国家安全机关和意识形态机关就已经收到来自斯大林的任务——准备向伊斯兰教界展开坚决进攻。然而，1926年8月2日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东方民族共和国宗教问题”简报就此做的结论是“根本改变党在国家东部的宗教政策是不可能的。”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东方民族经济文化落后，宗教传统深厚，其邻国又存在泛伊斯兰主义运动。

但是来自上层的压力在持续。1927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门起草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与穆斯林宗教运动斗争”的决定草案，其中提出要不停歇地“采取司法惩罚措施和司法之外的措施”对待“反革命的穆斯林宗教界”，严格限制用伊斯兰教法教育未成年人，以及为清真寺培养教职人员。这一问题经1927年2月27日和5月10日联共（布）中央

^① Сталин И. В. Соч. Т. 10. стр. 133.

组织局两次会议讨论后,会议决议草案提交给党的委员会,以积极促进反伊斯兰运动的开展。随后,1927 年 6 月 12 日,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穆斯林宗教界问题”的决定,其中这样写道“党应当视宗教界为与我们敌对的阵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斯林宗教界在与无产阶级作斗争时是统一的反动力量”,因此,“全党必须与整个宗教界作斗争”。^①该决定意在加强没收不动产工作,禁止建立共和国宗教中心,不允许通过增加开设世俗课程的办法对旧式宗教学校进行改头换面,反对在新的宗教学校中教授宗教课程,同时限制开设培养教职人员的宗教学校的数量等。其他委员会也通过了此类文件。

斯大林的上述讲话之后,苏联对伊斯兰运动展开了全面打击。1928 年 5 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决定关闭穆斯林宗教学校。而当时在中亚和北高加索的世俗学校只能够给 15% ~ 16% 的学龄儿童提供入学机会,有些地区则更低。如在土库曼斯坦,世俗学校只能够为 9% 的学龄儿童提供入学机会。达吉斯坦在贯彻该决定时有 359 所世俗学校,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有 28000 人,而中等宗教学校有 1500 所、学生 45000 人,^②无论是宗教学校的数量还是学生数量都远多于世俗学校。

为贯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各地开始采取措施关闭宗教学校。1928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关于宗教学校的决定,地方政权机关着手消灭初等和中等宗教学校。1929 年 1 月 6 日,纳明加城市国民教育处负责人伊尔加什·哈尔米勒扎耶夫带领社区委员会代表和民警一道在凌晨三点钟突袭当地一所清真寺,没收 165 本宗教书籍,用马车拉到警局,伊玛目以及聚众参加者被严厉警告,今后必须完全停止所有类似事件再发生。第二天搜查了伊玛目梅赫马汉·秋梁耶夫的学校,所有宗教书籍被没收,参加者被驱散。这些行动在费尔干纳谷地穆斯林中引发恐慌,民众纷纷藏匿宗教图书。一时谣言四起,称苏维埃政权要彻底消灭宗教学校并关闭清真寺。本来散布这些谣言的人是想唤起穆斯林反对苏维埃政权,结果谣言很快变成了事实。1929 年 2 月 7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将宗教组织定性为对群众具有影响力的

① РЦХИДНИ. Ф. 62. Оп. 1. Д. 221. Лл. 103, 111.

②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13. Д. 639. Л. 101.

合法进行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行动起来，关闭清真寺，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关闭清真寺，建立俱乐部”。

为配合政治局的行动，联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提出剥夺宗教团体成员和教区执行机关成员的选举权，剥夺神职人员的土地使用权。1929年6月3日，苏联政府将居住在农村的教职人员定为富农。1930年2月，在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地区，富农财产被全部没收，并将这些人强制迁离区、边区和州。

用行政手段强制关闭清真寺与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相互交织。随着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深入，只局限于停止清真寺的活动，许多清真寺被拆毁，成千上万的宗教活动家被驱离自己的居住地。在强制迁出的威胁下，许多穆斯林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当然，在集体农庄，他们要交出自己的份地、家畜和全部农机具。其后果是许多传统穆斯林掀起反抗浪潮。仅1930年1月在北高加索有记录的反抗就有11次，在卡拉恰耶夫斯克州起义的人群包围了州中心并持续了8天时间。为平息中亚的动乱，不得不动用军队。

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捍卫其追随者的权益。1930年4月28日，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主席穆夫提P. 法赫列特季诺夫给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П. Г. 斯米多维奇写信，以个人谈话的形式呼吁国家领导层关注非法强制消灭穆斯林宗教组织的行为，尤其是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此类行动的扩大化。他指出，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的1.2万座清真寺中超过1万座被关闭了，90%~97%的伊玛目和穆安津失业。他认为，苏联所有伊斯兰组织都处于完全被毁灭并从地球上消失的前夜。基于此，他请求国家重新考虑这一政策，指示地方政府停止行动，允许在清真寺中进行宗教活动，释放被关押的教职人员，允许被流放的教职人员返回。如果苏联容不下他们，应允许所有穆斯林移居国外。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前有14905座清真寺，到1936年4月14日剩下4830座；塔什干州的清真寺此时仅余不到1/3；舍拉巴茨克区革命前有101座清真寺，到此时则无一幸存。

1935年6月13日，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向当局提出召开穆斯林代表大会的申请。遭到拒绝后，穆夫提P. 法赫列特季诺夫打算解散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以示抗议。1936年1月9日，他在给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和乌里玛会议成员的一封密信里写道“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已不能做任何事，不能

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存在对于穆斯林已无任何意义。如果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关闭,或许还可以对苏维埃政权有所震动,迫使其改变自身对待宗教的态度。”^① P. 法赫列特季诺夫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就去世了。1937 年,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将他定性为“著名的反革命分子”^②。P. 法赫列特季诺夫去世后,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成员很快都被镇压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41 年卫国战争开始前夕。

四 卫国战争与苏联宗教政策的调整

德国在入侵苏联前认为,苏联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前有沙皇专制制度后有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化的民族压迫政策。那么,进攻苏联或许可以促进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导致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等趁机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进而瓦解苏联。德国尤其对苏联境内的穆斯林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苏联人口最多、遭受压迫最甚的少数民族。然而,希特勒的预期未能如愿。战争爆发后,成百上千的苏联穆斯林选择与苏联一道捍卫祖国。他们积极参加前线和后方的战役,为补充兵员,有的穆斯林甚至全家上战场;他们募集资金为红军供应武器、装备、粮食;照看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此外还要安置战争前夜强制迁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 17.5 万朝鲜移民。^③

穆斯林宗教组织的领导者和清真寺的伊玛目在宣讲时都号召信众与法西斯作战,全力支持苏联红军、苏维埃国家争取解放被敌人占领的祖国领土,击败德国。1942 年 5 月,在乌法召开了全国穆斯林宗教界和其他信教者代表大会。会上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新任主席穆夫提贾博德拉赫曼·腊素列夫发言说“没有一位穆斯林的儿子、兄弟或父亲在今天不去拿起武器为捍卫我们共同的祖国与德国人作战,如果说有例外的话,就是那些在后方工厂劳作的人,可不这也就是在为胜利尽力吗。我们作为苏联穆斯林,记

①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М. Ф. Муртазина, А. А. Нуруллаева: Ислам и мусульмане в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1999 г., стр. 140 – 141.

② Султанбеков Б. Сталин и “татарский след,” Казань, стр. 103.

③ 沈志华总编、徐天新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 363 页。

得先知穆罕默德的话‘爱祖国并保卫她，这是信仰的条件之一’。帮助那些投身前线的战士等同于拿起武器参加战斗，那些用和平的劳动顶替奔赴前线的战士留下的工作岗位的男人和女人们也同样是在参加战斗。”^① 这种号召唤起了穆斯林的爱国主义情感，让他们献身反法西斯战争。

当然，为战胜侵略者，仅有爱国主义激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军人的作战技能，需要不同信仰的人团结起来并肩作战。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在沙皇俄国时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就有不少参加军事行动的经验，中亚的穆斯林虽没有这种战斗经历，但是保卫祖国的愿望以及苏维埃和平年代共同学习和生活的实践使他们很快掌握了作战技能，与其他民族和不同信仰的同胞们并肩作战反击侵略者。在后方的苏联穆斯林给前线同乡写的信对于稳定军心、鼓舞士气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1943年6月，前线的准尉巴巴库尔·阿布扎洛夫就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他在布哈拉州基什杜万战区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卫国战争二级荣誉勋章。在他收到的信里，乡亲们告诉他，他们给他家盖了新房子，分了两头牛，还为孩子们缝制了新衣服。

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使得国家在对待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态度方面发生了一定改变。1943年2月13日，在塔什干召开了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人民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群众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写道“亲爱的战斗儿郎们！希特勒说我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人民是不配有人的称号的‘低等种族’，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回击愚蠢的蛮夷，让他们见识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的厉害！你们的打击力度越大，他们越能牢记我们人民的名字……儿郎们！兄弟们！大丈夫们！你们现在所进行的伟大战役，这是一场为争取苏维埃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圣战，这场圣战的旗帜上书写的神圣口号是‘荣誉、自由、复仇’。”^② 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言论使得穆斯林在德国与苏联之间还是选择了与祖国站在一起打击法西斯。苏联这时也不再像战前那样宣传说“伊斯兰教与其他所有宗

①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М. Ф. Муртазина, А. А. Нуруллаева: Ислам и мусульмане в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1999 г, Москва, стр. 143.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митинг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ародов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Туркмени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Киргизии. Ташкент, 1943, стр. 10.

教一样都是反人民的”；“宗教组织是反对苏联的战争贩子的积极帮凶”；“穆斯林通过‘圣战’（杰哈德、加扎瓦特）助力帝国主义者和人民中间点燃仇恨之火”。而是通过党和国家无所不在的情报系统普及，反击纳粹德国就是穆斯林为信仰而战的思想，穆斯林的希望再次被燃起。

穆斯林的爱国行动也促使国家对待穆斯林的宗教诉求有所宽容。1943 年 3 月，斯大林在给宗教事务中心主席穆夫提贾博德拉赫曼·腊素列夫的电报中，感谢在组建坦克纵队时给予捐助的穆斯林。斯大林的电报和穆夫提的回电一道刊印在报纸上，稍早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负责人也收到类似电报。这体现了战时国家对待宗教政治的宽容政策。1943 年秋，苏联政府同意，在塔什干建立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此后又在布伊纳克斯克成立北高加索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在巴库成立外高加索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在布哈拉，伊斯兰教中等宗教学校“阿拉伯人世界”复课。在城市和乡村，数百座清真寺重新开放；数千个伊斯兰教圣地归还穆斯林，几十万信徒又开始了他们的朝圣之旅，被监禁的大量宗教人士得以释放。同时，苏联当局批准恢复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天课（即济贫税），由宗教组织派专人征收，以利于战时需要。此外，宗教事务中心获得研究法特瓦的权利。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宗教事务管理局发布的法特瓦规定，所有家产数额达到 16000 卢布（1944 ~ 1945 年的价格）及以上的穆斯林，除了留下冬季和夏季的衣服、卧具、奶牛和 10 天的食物储备，每 40 卢布价值的财产每年必须缴纳 1 卢布的天课。^①从 1944 年起，穆斯林宗教组织获得组织穆斯林赴沙特朝觐的权利。这使得苏联的伊斯兰教组织摆脱了多年来与伊斯兰世界隔离的状况，这一举措的影响极其深远。

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在对待宗教包括伊斯兰教的态度、政策上的调整源于斯大林对战争的整体考量。斯大林认为，在战时条件下必须维护苏联的社会政治稳定，通过宗教动员不仅有助于强化社会稳定，也有助于扩大抵御德国的同盟。正因如此，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才对穆斯林采取“姑息”政策，允许他们缴纳天课以及其他宗教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穆斯林平民尤其是军人家庭的物质需求。在战时许多穆斯林成年男性都

①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М. Ф. Муртазина, А. А. Нуруллаева: Ислам и мусульмане в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1999 г., стр. 146.

上了前线，其家属的生存成了大问题。此时，宗教传统体现出积极影响。对这些家庭而言，清真寺成为最重要的获取生活物资的场所。但每个穆斯林社会都有宗教人士负责，居民可以依靠他们获取救助。同时，一些献祭的牲畜也被分给上述家庭。当时，生活保障的底线是，每个红军战士的家庭拥有一头奶牛。而穆斯林给前线战士家庭的不仅有奶牛，还有山羊等。

在塔什干州扬吉尤利区尤素波夫集体农庄，穆斯林提出倡议并由集体农庄全体大会通过决定，建立 17 头绵羊、1.5 吨稻米、1 吨小麦、4.5 吨蔬菜和 2.6 万卢布的基金，帮扶红军战士的家庭。集体农庄成员呼吁，所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者以他们为榜样，全国数百万穆斯林也表示支持这一创举。除了帮助红军战士的家庭，中亚、哈萨克斯坦、鞑靼和巴什基里亚的民众还在自己家里接纳了数百万从敌占区撤退的人员，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国家东部地区人民的关心和温暖，特别是孤儿得到了更多的照顾。例如，塔什干一位穆斯林铁匠沙姆哈麦多夫的家里收养了 14 名来自各民族的孩子，苏联东部地区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积极响应。

苏联穆斯林在卫国战争中的贡献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遗忘，苏联解体后仍被提及。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马赫迈特·阿赫梅托维奇·加烈列夫曾就此评论说“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苏联的穆斯林和其他信众一样，积极参加了战争并为胜利尽了自己的力量。在获得政府颁发的伟大卫国战争荣誉勋章的人员中，有数十万穆斯林的代表。仅我的同乡鞑靼人获得荣誉勋章的就超过 200 人，其他穆斯林中更有许多这样的人。”^①

然而，随着战争进入尾声，苏联对穆斯林的政策开始收紧。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需要各族在取得对德国战争胜利后，继续服从国家的统一意志，伊斯兰教作为坚定信仰的穆斯林遭受冲击。1943 ~ 1944 年，卡腊查耶夫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克里木的鞑靼人、梅斯赫季的突厥人、库尔德人等被从传统聚居区强制迁往数千公里之外、气候条件迥异的地方居住。这导致他们损失了 1/3，甚至一半的财产。战争结束后，民族史诗与传说再次被视为反人民、封建民族主义的余孽，其波及面较为广泛，包括鞑靼的“伊杰盖伊”、阿塞拜疆的“吉达比·杰杰·廓尔库德”、乌兹别克

① Гареев М. Мусульмане внесли достойный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 Ислам Минбаре, 1995, стр. 7.

的“阿尔帕梅斯”、吉尔吉斯的“玛纳斯”等。这些史诗的研究者也自然被视作有意识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宣传的罪魁祸首。著名诗人、乌兹别克文学奠基人阿里赛尔·纳沃伊被冠之以“穆斯林宗教黑暗面的宣传者”，而遭到鄙视，还有其他许多文化界穆斯林的代表人士遭到镇压。

五 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后的宗教政策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被称为“解冻时期”，苏联社会生活开始民主化进程，但并未触及宗教界。相反，在这十年间，宗教和宗教组织状况却在恶化。1954年7月2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关于科学——无神论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改进措施》，决议指出教职人员想方设法用宗教麻醉剂毒害人民群众，导致近些年宗教活动死灰复燃，开展宗教活动，所谓的“圣地”朝觐，到中亚“圣地”朝觐的穆斯林尤其多。决议呼吁必须揭穿宗教的反动本质及其毒害性，挽救被毒害的苏联公民，让他们能够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可见，这是要对卫国战争时期的宗教政策进行“纠偏”，要重新关闭清真寺，禁止宗教组织继续活动。决议在执行过程中难免有侮辱、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现象。1954年11月23日，虽然苏共中央委员会专门就“科学——无神论宣传工作中的错误”通过决议，批评了宣传工作中的不当方式，但是并无太大改观。1958年，苏共中央决定明确禁止穆斯林赴“圣地”朝觐。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决议提出，要在20年里将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与此相联系，宗教不能再存在下去了，必须采取包括强制手段在内的各种举措，促使宗教消亡。在此后的很短时间内，全国一多半的清真寺被关闭了。

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的18年（1964～1982），特别是他执政初期，在苏联穆斯林经济、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提升着力甚多。对此，许多国外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苏联穆斯林在劳动工资、教育、健康卫生以及平均寿命等方面的总体状况，要好于其邻国的同族。”^①但是在政治方面，对待宗教、宗教组织和信众的政策没有实质变化。在法律基础上认可穆斯林的宗教需求不具现实可能性。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无神论教育问题所做的一系

① Bennigsen A. , Henze P. S. *Soviet Strategy and Islam* , N. Y. : Oxford , 1989.

列决议中强调,评价伊斯兰教在苏联东部人民历史和文化中的作用时,必须要秉持明确的阶级立场,坚决取缔未经登记的伊斯兰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以保证每个劳动集体和居民点形成“无神论的社会意识”。在这些传统的伊斯兰教地区,不仅婚礼要按照宗教习俗进行,几乎所有死亡的穆斯林都要按照宗教习俗下葬,这意味着必须要请伊斯兰教宗教人士来主持仪式,这一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按照苏联的这种法律规定,只能请具有合法活动资格的清真寺,并且是经过登记后被国家认可的宗教人士主持才合法,依照这一规定,除非违法,不然穆斯林死后就无法下葬。在当时,登记在案的宗教团体活动范围受到政府限制。如土库曼只有4座清真寺属于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只能在相关的四个居民点进行宗教活动,也就是说,其他1600多个居民点包括首都阿什哈巴德和州中心城市察尔周、克拉斯诺沃茨克、马拉等地的穆斯林,不违法就不能邀请伊斯兰教职人员主持宗教仪式。而在塔吉克有3000个农村居民点,多数居民都信奉伊斯兰教,20世纪80年代初合法开放的清真寺只有17个,且大多在城市里。在达吉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有1660个农村居民点,清真寺只有27个,其他伊斯兰教传统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那么,有限的宗教场所与广泛的宗教需求的矛盾如何解决?事实上,地方官员对于各地信众修建宗教场所视而不见,这些非法的宗教场所十分普遍。1961年3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加强监督祭祀立法执行情况”的决议指出,鞑靼斯坦依法登记注册的穆斯林宗教团体有11个,而事实上存在的穆斯林宗教团体则有636个,后者都未经登记注册。20世纪70~80年代,在塔吉克合法开放的清真寺有17座,半合法的礼拜场所不下1000个。后者往往以茶馆、俱乐部、客人之家的形式建立,经常有莫斯科或者共和国首都下派的检查人员将其没收或者关闭。可是检查的人一离开,他们就重新恢复。

苏联当局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也令穆斯林感到不满。苏联时期全国东正教教堂数量缩减了10倍,而清真寺则缩减了100倍以上。当时,土库曼各界不满就来自于在该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州中心克拉斯诺沃茨克、马拉、察尔周等城市,东正教堂都正常开放,而穆斯林要求开放被政府关闭的清真寺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也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流放地归来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回到故乡发现,基督

教堂在 20 年的时间里几乎一直存在,而清真寺却禁止开放。由此积攒的民族怨恨情绪,积聚到苏联解体时彻底爆发。

1985 年 4 月,苏联国家领导层宣布的“改革”,允诺社会生活在各个领域进行大的变革。穆斯林对此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无论是普通信徒,还是伊斯兰教中心的领导人都支持“改革”,期待通过改革扩大公民权利,包括信仰自由的权利。1988 年 4 月,在古代罗斯皈依基督教 1000 年的纪念日邻近之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接见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时宣称,改革、民主、公开性也适用于信教者,对国家信教的公民没有任何限制,都享有表达自己信仰的权利。^①此后,苏联的宗教政策发生转折,宗教组织开始踊跃登记,新的教堂、修道院、教会学校不断开放,从前法律禁止宗教组织的慈善活动也恢复了。当然,这种变革最初触及的主要是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教其他一些教派。从 1985 年到 1988 年,全国登记注册了 838 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团体、57 个格鲁吉亚东正教团体、51 个罗马天主教团体、111 个基督教其他教派团体,穆斯林宗教团体只有 45 个。而按照信众人数,伊斯兰教是国家的第二大宗教,是除俄罗斯东正教徒之外各基督教派信众人数总和的数倍。

苏联在进行改革之际还遏制伊斯兰教的影响,主要源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加之,1979 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与之毗邻的中亚地缘政治愈发重要。1986 年 8 月,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加强与伊斯兰教影响作斗争”的决定。该决定批评了与穆斯林宗教斗争中存在的“疏漏”,要求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社会组织采取多种措施以“克服宗教偏见”。为督促地方工作,要求每年的 8 月 1 日,各部门要向苏共中央提交工作报告,汇报完成工作的情况及结果。同年 11 月,为有效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在塔什干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大会。戈尔巴乔夫呼吁与会者要“坚决且不妥协地与宗教现象作斗争”。苏联高层的这一立场意在压制穆斯林对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加剧、生态状况恶化的不满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苏联穆斯林提出的切实落实宪法关于信仰自由的政策。

为落实方针政策,国家政权机关一如既往地对待未经登记注册的伊斯兰教职人员,特别是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教职人员进行惩罚,继续关闭未

^① Правда, 30 апреля, 1988.

经国家准许开放的清真寺。此时的苏联已无昔日压制之力，穆斯林更无昔日忍耐之功。对于苏共的反伊斯兰行为，苏联穆斯林从沉默迅速转向激进，各地区开始抢占被关闭的清真寺，不经审批便聚众展开抗议游行，要求兑现宪法承诺的信仰自由。苏联这时能做的就是被迫让步。1989年，337个穆斯林宗教团体登记注册，这是1988年的10倍还要多。随后，清真寺大量开放。30年代后最初在清真寺下设小学里培养的正在成长的一代成为中坚力量。伊斯兰教中学的数量也增加了几倍，包括1989年在莫斯科大清真寺下设的中学。

鉴于上述变化，1990年10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信仰和宗教团体自由”法令，规定所有公民有权自主创立宗教团体，无须经过国家机关审批。宗教团体可以建立教堂，成立成人教育机构，为儿童建立宗教学校；可以生产、进口、出口、传播宗教产品、宗教著作和其他宗教内容的信息载体；可以从事慈善事业等。类似的条款也写进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例如，1990年11月7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的“关于信仰自由”法案。这是苏联时期通过的最后一批关涉宗教的立法，推动了苏联疆域内已经开始的伊斯兰教复兴历程。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心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组织之一。^①

[责任编辑：闫伟]

① Я. И. Здоровец: Мусульмане – Исламские лидеры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07г., стр. 64.

while , also with its expansion drive extends to other regions. Syria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 After the first Ottoman-Egypt war , the Treaty of Kutahia was signed , and Egypt's has ruled Syria. In this decade , Syria had set up a 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economy developed. The western political culture spread in Syria. The Egypt's ruling created a new era of Syrian history. Syrian began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Egypt , Syria , Muhammad Ali , Ibrahim , Ottoman Empire

A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f the Nitocris Adoption Stela

Ma Yizhou

Abstract: The Nitocris Adoption Stela was a very important stela in the period of Psammetik I in the 26th Dynasty. This stela recorded the King Psammetik I sent his daughter to the temple of Amun , became the successor of Adoratrix of Amun. By this way , Psammetik I controlled the priests of the temple of Amun , more important , he reunited Upper and Lower Egypt. So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late the text into Chinese with commentary , and it is useful to study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26th Dynasty.

Keywords: Ancient Egypt , Psammetik I , The Nitocris , Adoption Stela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oviet Union's Policy on Central Asian Islam

Shao Liying

Abstract: After October Revolution , Muslim's attitude on The Soviet Union changed from expectation to despair. Some of them attend the Basmachi Movement , and others became progressives. The former was suppressed; the latter's religious activity was stopped , owing to its great influence and non-cooperation for

government's secularized policy. After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happened, Muslim as the citizen of Soviet Union made a contribution to safeguarding homeland. Since the Gorbachev's reform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gradually enlivened.

Keywords: Soviet Union, Islam, Basmachi Movement, Central Asia

Arguments about the Terms of Islamic Revival in English Context

Compiled by Li Fuquan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of 1970's, there has been drastic dispute on the terms of Islamic reviv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dia, scholars first chose Islamic fundamentalism. But because of its Protestant background, Islamism which originated from France became popular since the middle of 1980's. Since the 1990's, the two terms became synonymous in the press and academia to a very great extent. As the disputes go on, new terms, such as political Islam, Jihadism and so on, emerge continuously.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terms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cognition, attitude and position on Islam.

Keywords: Fundamentalism, Islamism, America